

专题

◀ (上接5版)

安特生,文章也一直没有发表。可以说,安特生对新生代地质及中国地文学的研究,导致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

1926年10月皇储来华,安特生想借此良机促成中瑞往来及瑞方支持。皇储在华期间,协和医学院将举行欢迎活动,故安特生提前致信维曼,询问周口店发掘是否有新成果可以公诸于世。事实上,安特生来华之前已让维曼着手准备,他抵达北京后维曼取得新进展,并将师丹斯基关于牙齿化石的发现告诉了安特生。10月22日,地质调查所、北京博物学会以及协和医学院联合主办欢迎会,迎接瑞典皇储。该会由翁文灏主持,共有三场演讲。梁启超做了第一个报告,题为《中国考古之过去、现在及将来》。随后,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做了题为“*How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的报告,谈到萨拉乌苏、水洞沟旧石器遗址、1925年美国亚洲考察团考古学家尼尔森(N. C. Nelson, 1875—1964)在戈壁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和泥河湾遗址。安特生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宣布了北京人牙齿的发现,引起巨大轰动。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一发现,但当时并未得到学界公认,甚至德日进和葛利普都对此表示怀疑。

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借此机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申请,发掘周口店遗址,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1927年4月16日,发掘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由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展,为此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4月19日正式成立),步达生任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后来在此计划之下开展了很多活动,安特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25日,安特生将要返回瑞典,丁文江在北京顺利饭店设宴送行,邀请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 1890—1977)、德日进、谷兰阶、葛利普、步达生、翁文灏、金叔初、李四光等出席。

步达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后,经安特生和维曼推荐,邀请瑞典学者布林(Birger Bohlin, 1898—1990)来到北京,于1927—1929年从事周口店发掘工作,他与李捷合作,成为周口店发掘最初的组织者。后布林受斯文赫定邀请参加西北考察团,李捷也被抽调离开,杨钟健和裴文中加入发掘。1929年12月2日晚,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一消息轰动



瑞典远东博物馆今貌

了世界。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发现仰韶文化。由于安特生的出色工作,在丁文江的建议下,中国政府自1921年5月起续聘安特生3年。从这时起,他开始对西北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还曾到东北葫芦岛一带从事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他试图证明早期中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他本人对待这个理论相当谨慎),还出版了《甘肃考古记》(1925)一书。就这样,从地质学家到化石采集者,再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完成了身份转变。

出色的学术活动家

安特生不仅学问出色,还擅长交际,与瑞典、美国、法国各界人士有诸多交往。除皇储外,他还得到了一些财团的支持,比如他从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 1880—1932)处获得了《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资助。

安特生与北洋政府的上层官员亦有交往。为便于合作的顺利展开,他与丁文江签订了一些协议,商讨了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相关事务。丁文江在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坚持平等的原则,维护中国权益,如要求所有与中国考古及自然史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要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采掘出来的诸如彩陶类古物,一半交给中国,一半交给瑞典,没有副本的材料经过研究后需归还中国。此类协议的签订非常成功,安特生与中方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民国初期的中国,地质学研究刚刚起步,丁文江、翁文灏等年轻的地质学家们都在努力开拓中国的地质学事业,而安特生则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网络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学术交往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地质学刊物上涌现出了很多重要成果。1913

年10月地质研究所成立,开始培养一批年轻的地质学家。1915年底,研究所学生赴野外实习,安特生率其中一组赴江苏江宁、镇江、江阴一带。1916年4月2日,他还带领学生前往唐山开平煤矿进行毕业实习,为学生的论文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训练。不仅如此,安氏还为很多中国年轻学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例如上文中提及的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周赞衡,曾于1917年2—4月陪同赫勒考察江西、湖南等地。安特生对他颇为欣赏,1918年专门请Lagrelius资助他前往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学习,并悉心安排相关经费问题,周氏后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古植物学家。再如杨钟健,他在德国撰写博士论文时,安特生为他提供帮助,前往瑞典研究在中国收集的哺乳动物化石。

值得一提的是三门系的发现。三门系是由丁文江在山西河津发现的地层,后被广泛应用于华北地区。因安特生曾在相距不远的垣曲县做过调查,故丁文江知道附近有可资研究的地质材料,便前往附近的河津,在那里给安特生写了一封信(1918年8月20日),并附有河津的地质剖面图。安特生在写《中国北部之新生界》时引用了信中的成果。正是通过安特生的引用,丁文江的发现被广为采用,影响深远。

章鸿钊曾在地质学会初创时专门提到国外地质学家的一些重要工作,包括梭尔格(Friedrich Solgar, 1877—1965)、安特生、新常富以及卫勒(A. S. Wheler),他这样写道:

新地质学和民国同时产生之后,十年以来,外国的有名地质学家,常常在我们左右和我们共事,这正是使我们得到一种不能不发展的机会。最初设立地质研究所的时候,德国梭尔格博士襄助最力,后因欧战,解职去了。然尚有安特生博士、丁格博士、新常富、威勒(即卫勒)诸君,在调查所办事。安博士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现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

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这是极可感佩的。

安特生在地质学领域成果卓著,影响很大。解放前,学界对安特生的工作多持肯定态度,然而到了建国初,因政治形势的巨变,这一态度发生了转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四光,50年代初他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安特生,文中称:

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内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置之。安特生曾经参加过南极探险,而又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应该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对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睬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李四光不仅批评了安特

生,还批评其他欧洲地质学家,特别是巴尔博等不同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不仅在地质学界,在考古学界,安特生也因宣扬彩陶文化西来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近年来,学界对安特生、丁文江以及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又开始了重新评估,安特生的形象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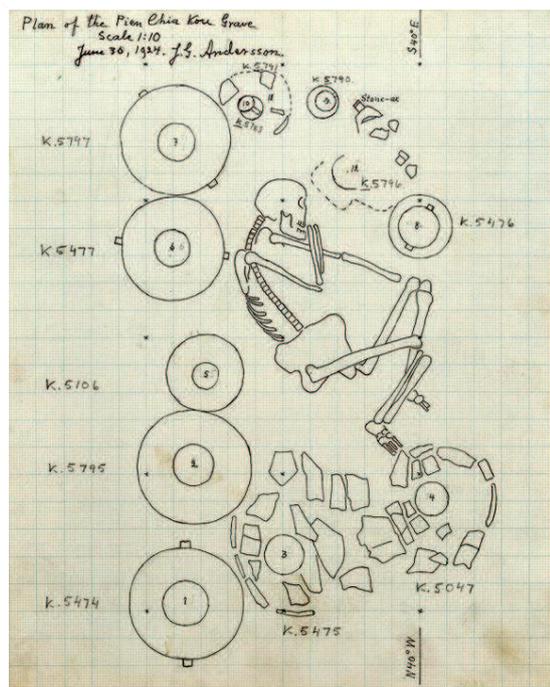
结论与启迪

安特生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他拥有成功必备的一大要素——好奇心。作为一名科学家,每当获得矿石和化石的消息时,他能够敏锐地抓住线索,追根溯源,龙烟铁矿等重大发现无一不起因于强烈好奇心的驱动。其次,他超群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及筹备世界地质学大会和组织地质调查所的经历和阅历,为他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他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跟各国学者真诚交往,相处愉快,与助手关系融

(下转7版) ➔



甘肃出土彩陶罐,瑞典远东博物馆藏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墓葬平面图
均资料图片